

# 城市舆论的接受与颠覆

## ——论《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之情感道德倾向表现

陈燕妮\*

**【摘要】**《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中唐传奇的佳作,是少有的与城市舆论有关的故事,而且因为舆论的参与,促成了这两篇传奇的发展以及在意义上的延伸。中唐长安的城市舆论对两场轰动京城的爱情的反应,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接受和颠覆的两种状态,表现出时代性的“逐情”观念。从两篇传奇在城市舆论中复杂的状态入手,可以解析中唐社会中复杂的情感道德倾向。

**【关键词】** 城市舆论;《莺莺传》;《霍小玉传》;唐传奇;逐情观

中唐以来,传奇发展进入兴盛阶段,名家名作层出不穷,《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此际的佳作。这是两个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两对男女主角都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成为当时城市舆论中的焦点。可以说,这两个传奇是少有的城市舆论中的传奇,而且因为舆论的参与,进一步促成了这两个故事文本的发展和意义的延伸。城市舆论对这两场在京城颇有影响的爱情呈现出同情和批判两种状态,并使得故事最终走向舆论接受与颠覆两种结局,这固然是作者的编撰效果,但又决不能仅仅作为其个人心理的展示。我们虽然不妨将这两个故事看成作者争取城市舆论的努力,然而从根本上说,它是城市舆论亦即某种社会道德观念折射的心理图谱。由于两场传奇的舆论发生地在唐代京城长安,因此这种城市舆论便具有了时代性道德观念评判的典型意义。本文拟就《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城市舆论场中复杂的状态作出分析,并由此解析中唐社会复杂的道德观现象。

### 一、《莺莺传》:城市舆论的接受

正如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说,“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sup>①</sup>在《莺莺传》中,文中的张生成为城市舆论的主要参与者和引导者。作者元稹成为他的代言人,有意识地从道德上不断解释其内心的“看法”,一步步将其爱情行为导入到社会舆论中进行取舍,

\* 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430079。

①[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并颠覆了已有的舆论压力,达成对自我行为的肯定,从而使城市舆论最终接受他的选择。《莺莺传》自“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起,已经宣告这个传奇进入到了城市舆论中。到张生不顾“友闻之者,莫不耸异”,进而以“尤物妖孽论”称“志亦绝矣”时,城市舆论的反应仍然停留在接受后表示惊叹且遗憾的层面上。细细品味“然而张志亦绝矣”一句可知,闻听此事的张生友人颇希望这段传奇继续发展下去。

正因为城市舆论是接受甚至欣赏这段爱情,所以对于文中的张生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在道德上是趋于隐形否定的。在这种舆论状态下,作为文中张生代言人的作者元稹不断地蓄意描述这段遇合,甚至以“尤物妖孽论”加以强调,都是为了颠覆已处在接受状态的舆论,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在道德上找到庇护的空间。这一点,后人颇能看穿心思。宋人王性之《传奇辩证》即有“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别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云云。在宋人的评论中,文中张生就是作者元稹。“悖于义”和“不中礼义”的行为,因“心不自抑”才托言张生来表其事。而作者元稹不仅在文中躲闪自己是主人公的事实,“反复抑扬,张而明之,以信其说”,而且在叙事中试图以蓄意的主观叙事,来颠覆已有的城市舆论。

何谓主观叙事?作者写张生出示莺莺“贻书”而“粗载于此”的传播,即为选择性叙事。莺莺回信的全部内容并不可知,所凸显出来的部分是莺莺知后会无期而缠绵欲绝的心意,“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在收到信之前,是张生主动先与莺莺断情,主导着爱情的走向,而此时接到书信的他却似乎被动地接受了诀别,所以才有了文中张生彷徨犹豫的反应,铺垫出他将此交于城市舆论加以委决的情节。

元稹使城市舆论着重关注的是莺莺的绝情和张生的多情。他在张生友人同情叹息之余,意图使张生扮演成无辜者和受害者。除此之外,作者还刻意强化莺莺“真”的身份,所谓续“会真诗”三十韵,正是要使与张生“中表相因”的亲戚莺莺的身份落在“神女”上。陈寅恪先生详细考究了“会真”一词的涵义,讲到“会真”与“会仙”同义,“仙”“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sup>①</sup>。可是信中和传奇开头都提到崔氏是张生远亲,“财产甚厚,多奴仆”。虽然崔氏可能已非此际唐代的高门,但是为“神女”的可能性不大,而元稹的叙述却成功地将舆论的兴趣转向莺莺最低微的身份和张生最多情的状态。

然而城市舆论却并未倒向张生,并未肯定张生断情选择的正确,于是元稹不得不祭起“尤物妖孽论”及“忍情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显然这是以古老的“红颜祸水”观和儒家君子道德观来维护张生的行为。在众人都倾向于他们续写这段爱情传奇时,元稹蓄意叙事的初衷再次失败,“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元稹和他代言的张生至此,其与城市舆论的对抗是失败的。元稹为了确保和强调张生选择的正确,他继续蓄意书写这个传奇向尾声的发展。从文本的整体叙述中,可以发现作者一直是有意识地将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引导到被舆论接受的道路上去。

有意识地建立起崔莺莺“尤物”多变的形象,是作者的主要手段。可以看到的是,张生所言的“尤物妖孽”具有多变且不可知的特点。于是作者从开始叙述时,便有意地将崔氏这一特点频频道来。一则张生庇护了崔氏孀妇母子后,崔氏母命女出拜。结果崔氏的表现颇为矫情,且看起来根本不愿意引起张生的注意。这种离奇的谢恩出场与她后来的情深意重恰成强烈的对比。二则张生在红娘的建议下以“春词二首”来试莺莺。莺莺显然是回应了这种试探。

<sup>①</sup>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7页。

而当张生满怀热望前去私会时,莺莺却又以端庄的姿态,持之以礼地回绝了张生。但当张生陷入绝望时,莺莺却以神仙般的梦幻形式出现在他眼前。三则他们在私会时产生了非礼行为,当张生在乎于此,莺莺竟闪烁其辞,看似对此毫不在意;可是当张生真正要始乱终弃时,莺莺又以非常怨恨的方式责备张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四则莺莺种种才艺出众,却往往不愿意出示于人,尤其是在情人张生面前,使张生“愈惑之”。五则莺莺曾在信中表明对张生的爱乃生死相随,而后很快委身他人。

另外,作者在小说中多摘取崔氏的言论,而张生的言论却少见于文,这实际上也是刻意打造崔氏形象的手段,即选择性的叙述。这种有选择的叙述无非是为了刻画并强调“尤物”的魅力和魔力之大,为最后的“忍情”做准备。作者有意识地营造张生在这段关系中无辜的形象。他在别人误解张生无情,不顺应时代宴饮风流习俗的时候,自我叙述出自己行为不乱的缘由,而后叙述其在崔莺莺以礼回绝后,并未纠缠,而是沉默于“绝望”。并且在与莺莺商量告母之事后,张生以“因欲就成之”的主动和负责的姿态出现。对莺莺的多变,张生常常报以“愈惑之”的反应。在莺莺被迫与张生绝情后,张生又以多情的姿态出现,“因赠书于崔,以广其意”,“求以外兄见……怨念之诚,动于颜色”。

这一切关于莺莺的描述从种种方面都极力建立起莺莺多变的“尤物”与“妖孽”形象。其实作者想要达到的“尤物多变”祸水论的效果是不得不打折折扣的,因为作者着力描述莺莺的多变,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张生对待莺莺的多变。两人像镜子面前的物与镜中的相一样,相互投射和影映的是一种相同的相。在某种程度上,张生和莺莺的行为都是在遵循世俗礼教之下的偶然越轨,而最终都是回归于礼教。但张生故意的迷惑和隐而不发的多变却成为城市舆论中的“叙事空白”,他成功地回避了城市舆论的注意力,亦即舆论的压力。

小说最后崔氏再嫁的情节,是作者对抗并扭转城市舆论的绝妙举措。有意思的是,是张生先弃绝了崔氏,但在写作的顺序上,作者却先交待崔的另嫁和崔的绝情,“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此目的在于将叙述的重点落在前者上,并进一步凸显张生在这个故事里无辜和委屈的位置,凸显他在道德上“忍情”的正确。此时在元稹着意的叙述下,传奇的两位主角相继再嫁再娶,已经不构成传奇的特点,而纳入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如此城市舆论终于被元稹的有意叙述而扭转,注意力转到他代言的张生频频强调的道德观上来,回归到舆论评价的终极所在。元稹写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可见这个再嫁再娶的后续故事终于达成了作者扭转城市舆论的目的,一个对女性始乱终弃者,最终不但成为多情者,而且站到了道德的高峰上。即便分别后,莺莺对于张生的诱惑似乎依然存在,这巩固了作者通过舆论而成为道德胜利者的地位。

城市舆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从接受促成、进而被颠覆、最后重新接受的轨迹。作者元稹也随着这个舆论的导向努力调整自己的叙述,以达到对张生行为肯定的目的,使其行为与城市舆论不相冲突。城市舆论的落脚点在于道德,最后作者也凭此达到扭转城市舆论的目的,所以这篇传奇从头至尾并非是一个客观的叙事,而是一个有意识地颠覆城市舆论的主观引导性叙事。

## 二、《霍小玉传》:城市舆论的颠覆

正如林肯有言:“你有舆论的支持,无往而不胜;没有的话,无事不败”<sup>①</sup>。在《霍小玉传》中,作者蒋防有意识地将霍小玉寻找李益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加以蓄意描述,使他们的爱情行为进入到城市舆论中来。此外他从道德上不断

<sup>①</sup>[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第1页。

对霍小玉的行为进行肯定性描述,对李益则从批判的角度进行叙述,使城市舆论倒向霍小玉。于是本不应受到城市关注的事件受到城市舆论的关注,本已完结的故事受到城市舆论的推动,获得了另一个传奇的结果,产生颠覆性效应。

《霍》在写霍小玉从李益表弟处获知李益背信再娶的消息,“冤愤益深,委顿床枕”后,开始表达城市舆论的反应:“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其实从原文来看,这个事件的传播早已开始。从李益决定要负小玉,“遥托亲故,不遗漏言”开始,这个事件已经处在开始流传的状态。李益一方是求封锁消息,而霍小玉一方则在寻探中将这场爱恋流播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先是问卜,后是变卖财产而打听消息。在这一过程中,遇到老玉公和公主的垂怜,以及李益表弟的泄露消息。由此可见,城市舆论已成气候,并达成一个倾向,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都倒向了霍小玉一方,这才有了“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论,皆怒生之薄行”的舆论结果。至此,城市舆论达到第一个高潮。

随着城市舆论的继续流播,出现了对这个事件评判的第二个高潮,即黄衫客的出现。他继韦夏卿以言辞规劝李益之后,再次以城市舆论引导者的面貌出现。此时城市舆论不仅对这个事件做远观和评判,而且还参与到其中来。黄衫客先是以言辞诱李益随其前往,最后强制性地挟持李益与霍小玉相见。黄衫客的行为隐含着城市舆论对这段传奇结局的设定,即要求李益兑现与霍小玉的盟约。

从作者蒋防的叙述来看,他明显地是站在反对和谴责李益薄行的立场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霍》的叙述也是作者主观蓄意叙事,旨在强化男主人公李益“妒痴”的个性,甚至起到借助舆论打击李益的效果。李益实有其人,且以“妒痴”闻于当时。对此许多典籍都有描述。《旧唐书·李益传》云:“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谈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他的这种突出

个性在当时的城市舆论中甚至成为一个评判的标准。李翱《论故度支李尚书状》云:“朝廷公议皆云:‘李尚书性猜忌甚于李益,而出其妻。’”小说中李益后来有出卢氏、三娶之事,“卢氏既出,生或侍婢滕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可见是从当时已成气候的舆论中来。故《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五中云“霍小玉事,据《李益传》,或有所本”。

卞孝萱先生认为《霍小玉传》是中唐政治斗争“牛李党争”的产物。唐穆宗时期,小说中的李益和作者蒋防分属于不同的党派。李属牛党,而蒋隶李党。于是蒋防欲此传使李益声名狼藉,起到打击其党派的作用。文中作者蒋防对城市舆论“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论,皆怒生之薄行”犹嫌不足,又将另一个唐人导入到小说的舆论氛围中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韦夏卿也实有其人,是元稹的岳父,也是李绅的好友,与作者蒋防同属李党,与李益属党成水火之势。而韦在此出现,与黄衫客的出现,一起为城市舆论进一步造势。于是卞孝萱先生认为“《霍小玉传》是一篇攻击政敌的传奇……蒋防不直接批评李益道德败坏,而借传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这种手法也是很狡猾的”;且“从种种迹象看出:《霍小玉传》是蒋防适应元稹、李绅的政治需要和迎合元稹、李绅的文艺爱好而作”<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两篇传奇都有主观蓄意之嫌。《莺莺传》是元稹为了维护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行为的主观叙事,《霍小玉传》则是蒋防为了打击政敌李益的主观叙事。两者中都有对薄行男主人公的谴责痕迹,但蒋防在道德上的蓄意叙事使霍小玉成为城市舆论中被关注、同情和肯定的对象,而将李益置于被谴责的位置,从而使城市舆论显示出一种颠覆的力量。

<sup>①</sup>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304、305页。

从文中李益与霍小玉见面时起,霍小玉便被塑造成一个时时处处严格依照社会道德观行事的形象。首先,在两人极度恩爱之时,霍便对自己身份以及将来有自知之明:“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她此时对李益发出委婉的询问,意在探询自己真情是否真能寄托,这也在强调自己虽为神女,但与其他神女不同,是怀着对这段遇合持续久远的期待的。

其次,当李益将授官离去时,霍以更加清醒的姿态为李益和自己的未来做了一个相望和恳求:“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在两人沉醉的世界中,始终贯穿着霍小玉的清醒判断。她明知与出身名门的李益不相配,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但又不愿以绝情的姿态了断这段关系,于是在社会道德观准则下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妥协意见。虽然最后放手爱人的离去,但其深情始终的形象十分感人。

再次,霍以神女的身份坚守与李益的约定,不惜在困窘中耗光所有的资财去寻找李益。这种行为也是对约定的坚持。紫玉钗的被迫出售,有着特殊的涵义,既是霍的无奈之举,也喻示着她将所有的尊严化作对这段情感的投入,因为紫玉钗是她一半尊贵血统的象征。她由有尊严地向社会妥协到丧失尊严地追求爱情,整个过程都能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

反观作者塑造的李益,卞孝萱先生认为:“‘重色’,与‘负心’,是蒋防所精心刻画的李益的两个过失。”<sup>①</sup>他从一开始便以自负才气的形象出现。才华是他的形象标志,与霍的遇合却是建立在浅薄的“鄙夫好色”的基础上。他对小

玉的询问以盟约书写下来,文中写道“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由此便可看出,李益的书写半为激情所驱,半为才气所逞,这使他的承诺一开始便有些廉价。等到真正与霍分别时,从“且愧且感”的反应中,可推知他面对霍的真情有不能承受之意。他无法以同等分量的真情与之呼应,所有的言辞在那份巨大的真情面前是苍白的。

李益在作者的笔下一直以良心不安的状态出现。不仅在他与霍相守之日有着私心的愧疚,而且当他应婚卢氏愆约后,他对此处理为“寂不知闻,欲断期望,遥托亲故,不遗漏言”。由此可知李益对霍的坚守根本没有信心,且低估了霍的真情。其中也隐有不安,因此希望以沉默的形式回避并了结这段关系。当他知晓霍小玉为此缠绵病榻时,内疚感更加强烈:“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这种努力回避与割舍更将其形象推向反面,至受到黄衫客的邀请,接近霍的住所,“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于是不待城市舆论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批判,自身的良心审判已使得他坐卧不安。

小说中细致地描写了李益就负情而产生的心理和影响。霍死于与李益的相会,“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又在冥冥中见霍的幻象。最后“生至墓所,尽哀而返”。以至于他“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李益的这些补偿行为越是全面,越是能印证内心巨大的不安和愧疚,也越是反衬出城市舆论对此施加的压力之大之远。城市舆论的余波并未因李的补偿行为放过他,他后来痛苦多疑的再娶生涯未尝不是城市舆论加诸其身的深远影响。

在作者蒋防的蓄意叙事下,霍小玉的坚持已经“超乎社会上一般认同的价值”<sup>②</sup>。这个溢出的剩余价值是她与其身份不相属的痴情。正是这种超乎社会认同价值的痴情最后颠覆了已有的社会道德观,使本应湮没在城市众生中的

①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第303页。

②[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陈磊、陈引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19页。

她成为城市舆论的焦点。同时,城市舆论被她感动并倒向了她,在舆论中她的形象变得丰满而生辉。

### 三、从两篇传奇的舆论氛围 看中唐情感道德倾向

《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两篇传奇由于作者的主观介入,或希望获得城市舆论的肯定,或希望借助城市舆论起到批判的作用,因而在叙事上都出现了选择性和加强性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城市舆论成为两篇传奇叙事的推进力量。其效果是,《莺莺传》以元稹为张生极力辩护的方式使城市舆论得以扭转,最终接受了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甚至对这种有违道德的行为不加谴责,而是转移到同情赞赏的角度;而《霍小玉传》则是以另一种构思方式将城市舆论倒向有违社会一般风俗(士人应与高门女子联姻)的方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社会道德。宇文所安在《浪漫传奇》一文中写到,中唐传奇文化“表现了男女之间出自个人选择而社会未曾予以认可的关系”<sup>①</sup>。这两篇爱情传奇在与城市舆论的关系中都体现了与社会的连接,都涉及到中唐道德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唐代士人的婚姻道德观。

从传奇中,我们能获知中唐以来士人生存状态与心灵寄托的种种。其时由于国势的衰退,士人不复初盛唐时期对国家与人生的热情,他们尽可能地躲避现实,在自我构建的空间中寻求寄托。从“大历十才子”在青山明月中打造的狭小的诗歌审美空间到中唐重主观的创作方式,都能看到这种社会加诸于文学的影响。传奇作为唐人创作诗歌之余的作品,同样受到这种影响,并自然折射出某种情感和道德倾向。

总体来说,传奇进入到鼎盛时期的中唐,爱情题材作品的成就最为突出,除了文体自身的

演进外,其情节的“传奇性”与中唐士人情感与道德观的复杂性是有一定关联的。唐代盛行的是政治性功利性很强的联姻方式,陈寅恪先生曾说到:“盖唐代社会承二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sup>②</sup>从中可见出,唐代的婚姻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崇尚的是科举士子与高门女子的联姻。“当时,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这五姓是第一流高门世族,如果加上姓氏同而郡望异的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则为五姓七族。他们虽经唐太宗借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的贬抑,仍‘旧望不减’,为维护其血统的高贵和纯洁,不与外族通婚而互相缔结婚姻。这更加重了他们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士林皆以能与之攀亲而为莫大的荣耀。”<sup>③</sup>《隋唐嘉话》中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不仅如此,而且可见出从一开始,唐士人的婚姻就置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舆论之中,时常受到来自舆论的监督与评判。

故而,《莺莺传》中的元稹为了让城市乃至社会舆论对他代言的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给予肯定,不惜蓄意主观叙事,将莺莺的身份有意叙述为“真”之类的神女。陈寅恪先生认为莺莺当属于寒门女子,不然文中的张生和为其代言的元稹在传奇和现实中都不会放弃这场可能致他高攀的婚姻,“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

①[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第105页。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22页。

③关四平:《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而且从中可知,其时无道理的“始乱终弃”的行为是遭到社会否定的。“其实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sup>①</sup>。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莺莺是寒门女子,那么文中的张生抛弃她另结新欢,是符合唐人婚姻道德观的,而张生为何要大费周折地来获得城市舆论的肯定,以此来颠覆现有的城市舆论?

从中也可知,莺莺的出身未必那样简单,而张生的再娶必定高于莺莺,这才形成了对张生意欲抛弃时的蓄意描述,将莺莺的身份有意转向“真”之类的神女身份,用合理的城市舆论的道德逻辑来构建自己的叙事,以达到作者的目的。我们从中能发现的是,直到莺莺再嫁之前,被张生贬低到神女的地步,都未曾使城市舆论达成对其身份和爱恋故事的否定,而出现的是时人叹息乃至意欲促成两人复合的舆论,这颇令人深长思之。

至于《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出身神女门户,李益却出身高华,出自“陇西李”。两人的分开,乃至李益的另娶“甲族”卢氏女子,按照中唐的道德观都是合理的。同时《霍小玉传》中的遇合对比起《莺莺传》来说,更像是城市中一则寻常的事件,本不该引起城市舆论的关注。名门士子在上京赴试选拔的过程中,与神女遇合,是唐人风流的一种表现,而且在城市中,是被早已认可的平常事件。霍小玉的身份是真正的神女,并非被元稹异化为神女的莺莺之属,而《霍小玉传》却拥有了比《莺莺传》更为强烈的城市舆论。原本看似合理的社会道德取向为何招致了城市舆论的关注进而批判和指责,甚至达到颠覆已有社会道德观乃至干涉的地步?

显然,在这两篇涉及中唐士人婚姻道德观,并与城市舆论紧密相连的传奇中,在唐代极力崇尚士人与门第联姻的风尚之外,还隐含着另一种道德观。

唐代流行的政治联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这种功利性的婚姻制时间一长,必然走向极端,也必然导致唐代士人对于感情的渴望与追求。他们往往向社会规范之外来寻找感情,从而刺激了娼妓文化的兴盛。唐末翰林学士孙棨《北里志序》中,详细记载了妓女与士人的交往情况:“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五代人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记有:“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师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说:“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同时,社会风气也助长了苟安之世的风流放诞之风。“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sup>②</sup>

种种“佳话”表现出,在崇尚门第婚姻的社会风俗外,中唐社会潜藏着对异性间真情的追求,于是才有了《莺莺传》中,虽有元稹反复蓄意的主观叙事,贬低莺莺的身份,称之为“尤物妖孽”,而在这段故事未曾完全结束之前,城市舆论多以惊诧和嗟叹的方式感叹莺莺的情真,甚至意欲成全,而不是依照由来已久的社会风俗道德观加以否弃。《霍小玉传》同样是一个例证,正是社会的“逐情”,才有了城市舆论的关注,以及对李益的强烈谴责进而全盘倒向霍小玉一方的趋势。这其中,霍小玉对自我身份的清醒认知以及对这段关系的维系都表现出对感情的极大投入,而李益看似合理的抛弃行为却触动了在传统风俗下潜藏的另一种肯定“逐情”合理性的道德观,从而使李益变得不合情理的负面形象,成为谴责的对象。

<sup>①</sup>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12、113、89页。

<sup>②</sup>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87页。

前者《莺莺传》中元稹故意维护张生,其蓄意叙事了结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断裂了传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逐情”在此结束。他维护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维护中唐社会流行的婚姻道德观。而《霍小玉传》则以作者着意叙事中霍的真情颠覆了城市正常的舆论导向,使一个本不该成为焦点的事件成为焦点,并以与流行的婚姻道德观相反的道德取向参与并衡量它的结局。

以上通过分析中唐传奇《莺莺传》与《霍小玉传》与城市舆论的关系,就其中复杂的情感道德观作出了探求。陈寅恪先生将此时传奇中的故事总以时代道德观视之:“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而至唐之中叶,即微之乐

天所生值之世,此二者已适在蜕变进行之程途中,其不同之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并存杂用,正不肖者用巧得利,而贤者以拙而失败之时也。故欲明乎微之所以为不肖为巧为得利成功,无不系于此仕婚之二事。”<sup>①</sup>两位作者都因其自我创作动机而对传奇有着特别的主观叙事,但都依靠并利用城市舆论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舆论是社会中显性或隐性道德观反映,“本身就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价”<sup>②</sup>,它“并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sup>③</sup>。在城市舆论或接受或颠覆的反应中,唐代的道德观隐然可见,而中唐对此的一定的反拨,表现出肯定“逐情”的道德趋向,循此亦可管窥中唐士人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之一斑。

(责任编辑:陆 林)

## Acceptance and Subvers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City: The Emotional and Moral Tendencies in *The Biography of Yingying* and *The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CHEN Yan-ni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Yingying* and *The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are both excellent works of *chuanqi* (传奇, tales of the marvelous) in the Mid-Tang Period. They are two rare books about public opinion in the city. It is the involvement of public opinion that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tales. The responses to these two love stories that stirred great sensations in Mid-Tang's capital of Chang'an could be classified as acceptance and subversion, reflecting people's values in pursuing love at that time. Through observing people's attitude to these tales, we can examine the complicated social mentality about love and morality in the Mid-Tang Period.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in city; *The Biography of Yingying*; *The Biography of Huo Xiaoyu*; Tang's *chuanqi*; concept of love pursuit

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82,83页。

②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3页。